

一股“寒流”袭来

华西村的老书记吴仁宝走了，他是一个时代中国农民的杰出代表。作为一名新华社记者，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，我就开始采访吴仁宝，四十年来从未间断。已记不清写了多少关于华西村的稿子。

然而，对于我写的那些报道和文章，吴仁宝在我面前却从不提起，只有一篇题为《富裕农民在想什么》的通讯，他几乎每次见到我时总要提到；有时向朋友介绍我时，他会十分动情地指着我说：“这位袁记者，可以算得上半个华西人了。好多年前，有一篇文章，我问他敢不敢写。结果，他写了。”

一篇通讯，何以会让吴仁宝几十年来念念不忘呢？事情要追溯到30多年前——

1978年初冬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之时，中宣部部长张平化会同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两家新闻单位，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宣传一批农村的先进典型，华西村被列为重点。

正在华西村蹲点的我，受新华社总社之召，与江阴的通讯员赵和兴一起奔赴北京写稿。不久，我们的长篇通讯《农民爱这样的社会主义》由新华社播发后，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几乎以整版篇幅刊出。原来只在江苏出名的华西村，一夜之间成了名震全国的先进典型。

然而时隔不久，新华社、人民日报、中央电视台和上海的众多媒体，纷纷收到发自江阴、南京等地的大量“人民来信”。这些信件无一例外地指斥华西村是“假典型”。先前被一些人嘲笑为“吹牛书记”的吴仁宝，此时则被晋升为“吹牛大王”了。我收到的信更是气势汹汹，斥责我“不遗余力为假典型吹喇叭”，“绝没有好下场”云云。在这股“强寒潮”的袭击下，报刊上再也看不到华西村的报道，到华西参观的人也日见其少，往日里人潮涌动、熙熙攘攘的景象，一变而为“门庭冷落车马稀”了。

尽管新华社和江苏省委很快派人做了调查，证实华西村是名副其实的先进典型，并且找到了“假典型”风波的根本原因乃是有人对华西有看法，但是要消除这场风波造成的不良影响却并不容易。人们对华西村疑虑重重、敬而远之。

果真“闷声大发财”

此时，我很担心的是吴仁宝：在这么大的打击面前，他会不会灰心气馁？不久，我再度来到华西，一见面谈到华西村的冷清景象，吴仁宝先是淡然一笑，接着便埋头一个劲地抽烟。我发现，他的笑容里分明含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压抑和苦涩。蓦地，他抬起头来，目光灼灼地望着我说：“没啥人，也好。我历来主张‘闷声大发财’，我们可以集中精力抓生产了！”接着，他凑近我的耳朵，悄声说：“过两年，你再来看吧，我保证让华西大变样！”

1983年深秋，我重访华西。啊，华西果真大变样了！村南田野里，一排排苍翠的水泥林护卫着一方方平展展的粮田，宽阔的水泥路伴随着笔直的水泥沟渠，贯穿田间，四通八达；村西，连绵的绿树簇拥着一柱柱巍峨的烟囱和一座座高大的厂房，载重汽车穿梭般来往于工厂与码头之间；村中间和村东头，漂亮的影剧院、古色古香的农民宾馆和一排排农家新楼，掩映在香樟树的浓荫里。

华西变了，变得更富了，更美了！

晚上，皓月当空。华西的农家新楼笼罩在水银般迷人的月光里。我信步走出农民宾馆，只见月影婆娑的香樟树荫下，一群群青年男女团团围坐，正兴高采烈地谈论什么。小伙子们告诉我，此刻，在那些灯光明亮的大楼里，都有人在学习和讨论。像他们这样的学习小组，全村共有36个，每周一个晚上，学政治、学文化、学技术。这种“学习周”制度，是老书记吴仁宝提出来的。这两天，大家讨论的题目是：华西富了，大家有什么新的想法。

农民是朴实而坦率的，他们并不隐瞒自己真实的想法。有的姑娘说，日子好过了，想把嫁妆办得阔气点，洋气点；有的小伙子说，若是每星期能看到三场电影，假日里再到西湖、黄山去遛遛，该有多快活！然而，更多的人说，吃了果子不能忘记树，没有三中全会带来的好政策，哪来华西的好日子！大家提出，日子好过了，一不能忘记国家，二不能忘记集体，三不能忘记左邻右舍。

多么可爱的华西村，多么可敬的华西人啊！我思潮滚滚，久久难平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投入了紧张的采访。华西人爱国家、爱集体、爱兄弟单位的感人事例，一桩桩、一件件，记满了我的采访本。我找到吴仁宝，笑着说：“这一回，我要写些这‘三不忘’。”吴仁宝知道几年前我收到的威胁和咒骂的事，他笑道：“就看你敢不敢写啊。”

想起当年一些事

◆ 袁养和



■ 作者与吴仁宝的合影(左一为作者,中为吴仁宝)

1983年12月6日，我写的通讯在人民日报二版头条，以通栏三分之一的版面刊出。之后，其他媒体也纷纷跟上，华西终于走出了舆论的寒流，再次以他们崭新的姿态，向全国人民报告他们新的进取。

克己奉公是楷模

多少年来，不管什么单位，有记者登门采访，主人设宴陪同，几乎成了一种“常规惯例”。然而，四十年来，在我的记忆中，吴仁宝却从来没有陪我吃过一顿饭，喝过一次酒。

每次到华西采访，我都会安排好我的食宿。而吃饭时，如果他在场，他总是口衔香烟，笑眯眯地过来敬一次酒，然后站在一旁，与我攀谈。不一会儿，他便挥挥手，抱歉地笑笑告辞了。

时间一长，我暗自思忖，也许我与吴仁宝太熟了，“情深恭敬少”，表面上的客套自然就不必拘泥了。对远道而来的贵宾，他恐怕不会这样吧？

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是老书记的“惯例”！哪怕是省一级的领导来访，老书记也不陪同就餐，同样是回家和老伴一起吃饭的。

如今，住房问题几乎牵动每一个人的神经，多少人为此费尽心计。这个问题，吴仁宝又是如何对待的呢？

四十年来，我到他家里记不清有多少次了。上世纪70年代初，华西新村建成，绝大多数农民住进了新瓦房，吴仁宝却仍住在祖上留下的老屋里。70年代末，华西第一批新楼建成，他又是等大多数人住进去后才搬进。后来，村东头300幢农家别墅拔地而起，一时轰动全国，谁见了谁都眼馋，可是吴仁宝仍“按兵不动”。以后，华西第六、第七代欧式别墅又冒出来了，造型别致，气势不凡。大家说，这一回，老书记该搬进去了吧！然而，新迁的居民中还是没有他。

直到去世前，吴仁宝依然住在上世纪70年代的楼房里。

一个人，在困难的环境里能艰苦奋斗、甘之如饴，这是一种很了不起的精神。然而，当他创造了持久的辉煌以后，却年复一年，依然保持着淡泊的本色，这又是何等的情操，何等的境界啊！

不同寻常的追求

这样的境界从何而来？这要从他的追求中寻找答案。

从上世纪60年代起，我辗转大江南北数十年，采访过的先进单位可谓多矣，其中一些特别成功的典型，其带头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积极进取，发展经济，造福一方。吴

仁宝同样具有这一特点。但是，他的理想、志气和追求，却远远不止于此。有好多次，他对我说，他要把华西作为“试验田”，专门从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试验。他说，在农村，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子，大家心里都没有数，他要在华西这块土地上，用自己的双手来探索，来创造。

华西村原来的面积是0.96平方公里，刚好是中华大地的千万分之一。吴仁宝就是要在这块土地上，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农民乐园。“我要让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来看看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个啥样子。”好个吴仁宝，他分明是以天下为己任，自觉地肩负起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！

鉴于那一场“假典型”风波对华西造成的严重伤害，吴仁宝郑重其事地给当时江苏省的省长顾秀莲写了一封信，恳切地希望“上头”对华西的试验不要多加干预。吴仁宝说：“试验成功了，欢迎大家来总结经验；若是失败了，一个华西村也捋不了天。”

时至今日，吴仁宝的“试验田”取得了令世人震惊的大丰收！

这丰收，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。物质上，一个让人们钦羡不已的“天下第一村”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；在它身后，一批塞上、关外、井冈山下的华西村（华西与当地结对扶贫）纷纷涌现出来。精神上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成套经验在华西村诞生了：建设新农村，必须走共同富裕之路；共同富，先要集体富；一个村富不算富，全国都富才是真正的富；只有“口袋富”，再加上“脑袋富”，才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……

伴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开展，吴仁宝在华西这块土地上创造了多少令人瞩目的奇迹啊！而最令人惊叹的，莫过于农民素质的变化。在这里，说惯了吴中土话的“乡巴佬”，如今也学起了日语、英语和法语；原来连柴油机也不会开的“土包子”，如今能熟练地操纵电脑；还有不少人跨出国门，到日本、美国、德国去留学，专攻国际贸易……

吴仁宝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：社会在发展，时代在进步，农民再也不能像从前那个样子了。城里人有的，农民也要有；城里能办到的，农村也要能办到；城里人的好日子，农民也要过好。这话就如一根闪光的红线，把吴仁宝的一生贯穿起来了。半个世纪以来，他所做的一切，不都是为了填平农村与城市之间的鸿沟么？改造农村，改变农民，为农村增光添彩，让农民扬眉吐气，这就是他毕生的追求啊！

“农民的幸福，是我最大的快乐！”他的肺腑之言，落地有声，感人至深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已是挈妇将雏之人，但却居无房。当时我虽在事业单位，吃皇粮的，但无房源。内人插队上调分到集体单位上班，更无房可分。无奈之下，只好挤在泰山家的小阁楼上栖身。

住的时间长了，觉得非长久之计。阁楼小且不说，家具无摆放处，而且上下极为不便，特别是读幼儿园的儿子，容易摔伤。于是有迁出之意。和妻商量下来，还是租房吧。是时我工作在吴淞，妻上班在宝山，妻体弱，为让她上下班省力些，决定到宝山租房。

那时候尚无“商品房”的概念，人们住的都是公房，小房型，所以住房富余的人家极少，墙上也不见有“租房”的告示，因此宝山城厢租不到房。无奈只好求其次，妻托当地人去城厢周边打听。数日后，终于在东门外找到一家愿意出租的农村房。了解下来，其实户主并不务农，女的在上棉八厂做工，男的则凭手艺干木匠活，夫妻两人积攒了点钱，又得到双方父母的资助，就在城外不远的田埂边（那时的宝山，出城圈便是一片片农田）围起了独立小院，造了一幢二层小楼。围中另有一小屋，空着可租。

那天前去看房，见那所谓的小屋果然小，仅8平方米。水泥结构，平顶，呈灰白色，方方的，像个碉堡。毫无疑问，此屋当初建造时不是给人居住的，而是为了堆放杂物的。一看下来，租是不租，颇费踌躇。但最后的结论是屋虽小且陋，亦可挡风雨，妻上班也方便，步行10分钟即可到单位。再说，还可和主人家共同享用院子，暖日里可在院中用餐，热天可在院中纳凉。往远处想，此处只是暂寓，并非久居之地，说不定哪一天，便能乔迁。这样思忖下来，于是拍板：租。与户主谈定，租期不限，月租8元。按工资比例推算，当时8元等于今天的200元。

这个巴掌大的地方，要摆放家具，不啻是螺蛳壳里做道场，只得精而又精，简之又简。经过一番勘察，最后的布置是：大床一张，矮凳三只（幼儿园里孩子们用的那种），供进餐用；贴墙放一五屉橱，上置12英寸黑白电视机和摇头风扇。我的寝具则是一张钢丝行军床，夜张日收。碗橱煤炉俱放院中，上搭篷罩之。一切安排停当，便可过最简单的生活了。

除去凄风苦雨和天寒地冻的日子，我们下班后将儿子从幼儿园接回直至入睡前多滞留院中。饭菜烧好后，将小桌小凳搬出来在院中用餐，餐毕，拖一根长线将小电视放在桌上收看。那时候频道少，节目品种也不多，但越剧倒是常播，出镜的多是袁雪芬、范瑞娟、徐玉兰、王文娟、吕瑞英、金采风等名角，所以妻子很满足。我不爱看越剧，便在晾衣架上吊一只灯泡读书。儿子则与户主的一双子女在院中戏嬉玩耍。星期天，我便携稚子去江边石缝中拣蚌捉蟹，有时能拎半铝桶回来。

难熬是夏天。那水泥小屋有超强的聚热功能，其热气夜深不散。但是儿子必须早睡，于是只好辛苦那台带有噪声的电扇，整夜不得休息，摇头到天明。我则将行军床支起在院中葡萄架下，半躺其上，手摇扇子，目视叶缝中淡淡的星光，心静如水，了无尘虑，渐合双目，进入梦境。一觉醒来，万籁俱寂，斗转星移，于是收起行军床悄然回屋。此时，风声和妻子均匀的鼾声相应和，闹中显静，已然是“鸟鸣山更幽”。

可爱的8平方米的水泥小屋，我们一家三口在这里度过了春夏秋冬四季。

1986年，我家可以说说是柳暗花明。妻所在单位为她在月浦新村二村分了一套两居室的住房，50平方米。虽然地处偏远了点，但和8平方米比，宽敞了不是一点点，而且还有煤卫设备，从此总算有了一个像样的家。随着上海公用住房建设步伐的加大，1998年，宝山区教育局又分给我一套新建成的住房，三楼，两室一厅，70平方米。这在当时，算是很不错的单元房了。买下此房的产权，我只花了几万元钱。儿子结婚后买房另住，这70平方米就我们老两口住，相比昔日的8平方米，真有天壤之别了。

住过8平方米，好像咬过菜根一般，如今只觉幸福上了天！

三人住
8平方米
◆ 韦德锐